

亚当·米奇尼克访谈切·米沃什

唐浩 译

米奇尼克：你常说，你是立陶宛大公国之子。大公国到底是什么？

米沃什：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周围的人都归属大公国的传统，虽然他们彼此间尊崇的东西大不一样。例如，米兹托维奇神父，一个极端保守分子，赞美大公是特权阶层和世袭贵族的创造物。他视自己为这阶层的一员，并为这种特殊身份而倍感自豪。他和他的同代人都以说立陶宛语为荣，但他们的上帝禁止人们谈及立陶宛国是小农阶级创立的。

不过，作为一个年青人，我真的不太在意这些。我是士绅阶层的一员，这阶层错综复杂，能感觉到民族和阶级的冲突。我关心这样的问题，但还没到问自己选择波兰还是立陶宛的程度。我主要关心的是诗歌，法国诗歌，先锋派，那些先锋性的东西。

米奇尼克：波兰思想有两位伟人，毕苏茨基和德莫夫斯基（Dmowski）。两种不同的感情，两种价值体系，两种不同的思考国家和波兰民族的方式。你会说些什么，从立陶宛大公国的视角，对于这个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的地区，什么是它的机遇和陷阱？

米沃什：机遇和陷阱……作为一名少年，一个学生，我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我和一个土生的立陶宛人很要好，对于民族和政治问题，他自然有不同的观点。

米奇尼克：你说的是安契维修斯，那个立陶宛的活动家？

米沃什：对，对，我的朋友弗兰纳斯。我一直对德莫夫斯基有极其负面的评价。另一方面，我很多时候坚定地支持毕苏茨基。事实上，我想这些态度是家传的。我们家族对德莫夫斯基和他的支持者从来没有丝毫的同情。但是这危险，这陷阱显然是巨大的，因为如果你理解了别人的观点，这会削弱你为自己民族说话的热情。

例如现在，我明白到迈克尔·罗默教授的立场是正确的。罗默是把立陶宛视为自己祖国的波兰人。他认为自己是说波兰语的立陶宛人……现在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立场，但要坚持它却异常艰难。今天我还认识到，毕苏茨基的建立联邦的理想注定要失败，因为没有人会支持——波兰人不会，立陶宛人不会，白俄罗斯人不会。立陶宛人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反对意见：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波兰语和波兰文化的极大威胁。他们逐渐地波兰化了，纵使是在一个非强制的情势下。他们被波兰文化同化了，而且他们的语言也逐渐地被剥夺了。

但我想解释说，我从不假装是立陶宛人，因为如果谁说立陶宛语就是立陶宛人，或者谁说波兰语就是波兰人，就很难坚持罗默的那种立场。立陶宛不像芬兰，在那里瑞典人和芬兰人长期和平共处：曼尼汉姆元帅是民族英雄，但他不说芬兰语。当诗人托马斯·文克罗瓦和我在贾基洛尼亚大学对话，他是一名前波兰的立陶宛人，而我是前立陶宛的波兰人。

米奇尼克：有一个人和你非常亲近，既是感情上的，也是家庭关系上的，奥斯卡·米沃什，他是我行我素的非凡人物。一个杰出的讲波兰语的法国诗人，他成了立陶宛驻法国的大使。

米沃什：我们必须记住他成为立陶宛人的背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属于巴黎的波兰艺术家社区。他的自传有一个波兰的，而不是立陶宛的视野。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在战争时期。什么激发了他？除非我记错了，1917年德莫夫斯基是在美国，并在那里设计了他的信条。这在美国公众舆论中引起了很大程度的对波兰的不信任。德莫夫斯基认为东边的所有地区都该划归波兰。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并不存在。因此当奥斯卡·米沃什听到了这些，他说，“如果波兰不承认独立的立陶宛国，我会成为立陶宛人。”

米奇尼克：我们应该怎样评判第二共和国？这个问题曾经是禁忌，过了许多年，最近又重现了。

米沃什：现在所说的全都不是事实。是理想化的，不真实的。那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它围困在可怕的问题里。政治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

米奇尼克：当你说“政治的”，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米沃什：我想的是，这二十年[1918—1939]非常悲惨的历史。从第一任总统被刺杀开始。接着是众议院的统治，一群类人猿。然后是军人统治和他们的衰败。发生这一切的背景是世界的经济危机，骇人的贫困，和资源短缺。

米奇尼克：但是波兰能怎样做，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股掌之间。

米沃什：我不知道，但这个国家主要的失败是小肚鸡肠、囿于一隅，证据就是波兰归侨的自杀。彼得拉日茨基教授自杀了。莱德尼茨基，伟大的波兰活动家，俄国归来，自杀了；“民族民主运动”(endecja)令他无路可走。

米奇尼克：但这也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许多伟大的天才涌现了，还有一些很好的报刊杂志。基本上，面对这个时期的文化，我这一代人负债累累的：泽罗姆斯基、达布洛夫斯卡，“斯卡曼德”社，斯特鲁格、古姆布罗维奇……

米沃什：我不知道，这很难讲。对于我这一代，成长于危难之中，整个现实都是飘渺的、虚幻的。就像亚历山大·瓦特在《我的世纪》里写的，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幢纸房子里。

米奇尼克：你生活的维尔纽斯，你的朋友圈，最后证明是波兰的知识生活里极富创意和极其重要的一——卡特·马契维奇、斯坦尼斯洛·斯托玛、亨里克·德姆宾斯基、斯特凡·耶利科夫斯基、安东尼·古鲁别涅夫、提奥多·布尼茨基。你们能一直保持朋友关系吗，或者有什么变故令到你们不能？你们在一起，然后古鲁别涅夫和斯托玛成为知识分子里的天主教徒，而德姆宾斯基和耶利科夫斯基成了共产主义者。你属于左派，尽管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是什么状况呢？我想了解一下，那些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成为某种文化符号的人们，他们之间会不会有憎恨。

米沃什：大致说来，我们或多或少构成了一个团体。当然，在不同时期人们会越走越近或者分道扬镳。我在学校和斯托玛成了朋友，然后我们分开了，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憎恨，没有互相指责。我曾经和耶利科夫斯基非常要好，但是当他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就不再见面。仅此而已。

米奇尼克：许多年前，我有机会和马契维奇神父交谈，他写过一本优美的回忆录，你提到过他。我问他亨里克·德姆宾斯基的事情。他眼眶盈满泪水，他说，“他就像我的儿子。”他这样说的时候，已经知道德姆宾斯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印象很深，竟然是这么温暖的语调。

米沃什：这是很好的例证，关于我们这个团体的氛围。德姆宾斯基很有魅力，讨人喜欢，而且多情。他在维尔纽斯地位超然，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德姆宾斯基是一个神话——激情的演说家而且颇为英俊。

米奇尼克：依你看，他是诚实的人吗？

米沃什：德姆宾斯基非常情绪化，易冲动，虽然非常聪明，但可能时常犯傻。我更愿意挑选他这个版本的肖像画，一个狡黠的伪君子。

米奇尼克：我想向你询问一个我和朋友经常讨论的人：提奥多·布尼茨基。

米沃什：那是我生命里的重要篇章。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听说了这个出现在利里维尔高级中学的空想诗人。没过多久，我和他在一个秘密的文学组织碰头了。一个家庭式聚会，在鲁德尼斯奇咖啡馆，翻阅《斯卡曼德》期刊，讨论诗歌——这对于我是纯粹的乐事，一个十来岁，发育期的诗人，而且是和布尼茨基一起。后来，在大学，在“远行者”俱乐部和“Zagary”社，我们始终在一起。我经常拜访中欧学院，他在那里当秘书，离鲁德尼斯奇咖啡馆不远，我们经常在咖啡馆坐上几个钟头。我们不时见面。后来，我意识到这样对布尼茨基不好。他结了婚，有孩子，过着舒适、中产阶级的生活。他来自地主家庭，经常到亲戚家的乡下庄园度假。但是读了他写于战前的诗歌，我被震惊了——那种失落感，无望，淤泥般的意象，来自湖底淤泥般的生活，诸如此类。当时，我把这理解为他生活绝境的隐喻。依我看，他走在错误的窄路上，他的生活选错了方向，他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

在所谓立陶宛占领期，维尔纽斯回归立陶宛时 [1939年]，约瑟夫·马契维奇出版了《每日新闻》，布尼茨基是报纸的责任编辑。他更关心事件的文学性，因此我们在同一个编辑队伍里再次合作了。

然后是苏联占领期。我不是目击者，因为我逃跑了，越过了“绿色边境”。我的前女友写信给我，她说起布尼茨基：“我无法想像你能描述提奥多的那种恐怖。他已经选择了恐怖的路，但他还是选了那种最坏的可能。他不明白那个年少懵懂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严峻的事情正在这里发生，人人必须承担责任。”她似乎想说明，所发生一切的是他花蝴蝶的天性，他本性难移的结果，因为他少年得志。

当德国人入侵，他和他的亲戚躲了起来，他在兹姆德扎遇到弗兰纳斯·安契维修

斯。他们在一起，试图做出决定。在红军逼近的时候，安契维修斯，当然，他想除了逃跑没别的办法，就带着妻女搭船逃往瑞典。他们被德国人抓住，押了回来。于是他们沿着通常的路线逃跑，穿过东普鲁士，在炮火之中，全家都是这样。

但布尼茨基决定不逃跑。这是艰难的决定；他有妻子和小孩。他回到维尔纽斯。他没想到会因为写过前苏联的诗而被杀。他没想到他们的记忆那么耐久。

对于我，主要的解释是他战前的绝境：一潭死水，淤泥底部，他的个人生活以及其他方面都停滞了。

米奇尼克：在很多年前你给一个文集写的评论里，你大量引用布尼茨基写于苏联首次吞并立陶宛的周年纪念日的这首诗。如果有什么水晶般透明的例子可以证明和侵略势力、和敌人的合作，显然就是它了。你是怎么想的，读这首诗的波兰人有权对波兰诗人有所期待吗，以及应该怎样惩罚这种诗人？毕竟，如果一个人可以赐予奖赏，也同样可以报以惩罚。这是绝对基本的问题，关于作者和他的读者之间的关系，关于作者肩负的责任。

米沃什：我不是道德主义者。我尽量避免论定。如果最好的波兰诗人，像特兰伯茨基一样写过可怕的东西，如果他们向叶卡捷琳娜大帝进贡邀宠，在维尔纽斯给沙皇写密信……不过，我相信像布尼茨基这样的罪人要比那些偷偷通敌的人更伟大。这是很难衡量的，但文字确实有一种力量。文字是严肃的事情。

米奇尼克：特兰伯茨基是一个好例子。同样的罪过，连主教都被波兰人绞死了。特兰伯茨基很幸运；没人绞死他。

米沃什：当然，事实上波兰历史无数的通敌者，各种类型的，各种变相的——应该说——不同程度的牵扯。布尼茨基是唯一因此丧命的作家。

米奇尼克：这就是他的传记构成了一个寓言的原因。

米沃什：但后来他写了别的东西，在他 1941 年 6 月的不光彩行为之后，当他住在亲戚的庄园里，这些作品显示了很大的自我谴责。他像是在检测自己的良心。但随后的死亡令他处在不利地位，他无法修正任何东西。

如果谁认为自己无可指责，他可以去论定。我不会论定布尼茨基，因为我在自己的生涯里做过肮脏的事情。在 1945 年，我在克拉科夫写了一些文章，在我的角度它们可能是真诚的暴怒的产物，但它们的确令我不光彩。

米奇尼克：我想这是不同的情况。我不会在 1945 年克拉科夫的写作和 1941 年维尔纽斯的写作之间划一条通常的等号。在我的角度这可能是缺点，但我看到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

米沃什：那就说它令我没资格吧。

米奇尼克：让我们不要过多地用作为社会学观点的道德眼光看待它。文学总是包含作者和读者的一种关系。读者有权期待作者什么呢？

米沃什：对于我，波兰文学处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传统，例如有来自法国文学的。在整个德国占领期，法国文学如常运行。当你读到文学如何在地下运行，你可能会嫉妒法国。当然，有一些公开的通敌者而且他们可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布尼茨基不同，他可能毫无意识，正如我的女友写的，在那些欢乐的维尔纽斯的日子，一切都是小小的玩笑，现在它结束了。在那个魅力之城，永远不会有杀死任何人的问题。

米奇尼克：战后，德国占领结束时，法国人判处布提席拉绪和德鲁·拉洛雪死刑。你怎么看波兰人杀死布尼茨基这件事？

米沃什：你知道约瑟夫·马契维奇的事件。他被判死刑，而瑟吉兹·皮亚塞茨基应该执行这项判决。但他没有。后来，在罗马，他说他怀疑判决是否正当。

米奇尼克：那是另一个问题。但这是允许的吗，杀死一名作家，因为他写了哪怕是最可鄙的诗？这个问题我自己无法回答。我很高兴布提席拉绪被处死，不是因为他的写作，而是因为他的其他行为。如果普特拉门特（Jerzy Putrament）被处死，会因为他诗人同时也是政治官员。布尼茨基不是政治官员。他被杀是因为他的诗，即便是最可憎的那种诗，但他还是因为诗而被杀的。你怎么考虑？

米沃什：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道德主义者的问题。显然，当一个道德主义者，我还不够格。有些人认为我的写作是道德主义的，但不是，我觉得自己并非是无可指责的，或者说有资格去论定什么是道德的。我总是被一种直觉引领，而不是良心。

米奇尼克：我觉得你是道德主义者，但你不是道德家。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你对自己有很高的道德要求，而不是对其他人。

米沃什：哦，好吧。和你谈话我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因为你有这种道德主义的决心，而我就像那些沉溺在自己生活的人，几乎无法令自己的下巴高于水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整个人生充满了悲剧事件。如果我发现事情这么艰难，我又怎么去论定。

米奇尼克：关键不在于论定任何人。关键是我们，其他人是如何论定这一切的。你看，很多年没人提起布尼茨基，他被处死，是一个通敌者，但每个人都在说马契维奇，他没被处死，也是一个通敌者。今天，局面正在逆转。今天，甚至是波兰最杰出的批评家，都在把约瑟夫·马契维奇塑造成一种偶像。

米沃什：哪种意义上的偶像？

米奇尼克：他是唯一正确的。你怎么比较布尼茨基和马契维奇这两件事？

米沃什：布尼茨基和马契维奇是完全不同的个案，因为马契维奇有他自己的观点。他和立陶宛大公国有很深的渊源；他了解本土的各民族，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他了解他们的观点，而且他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可怕的憎恨。

马契维奇发现“祖国军”（Home Army）不合胃口，因为它只代表大公国的一个民

族。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它体现了单一民族的路线。此外，他致力于别的东西：与苏维埃怪物作斗争。这种观点和来自祖国波兰的看法是不同的。他不关心谁和苏联打仗，谁和共产主义为敌，只要有人这么做就好。这就是他在他的书《说话无须叫嚷》里申明的。

米奇尼克：但是在那些德国占领期目击了事件的波兰读者，他们真的会考虑这些吗？这是他们公认的通敌行为。布尼茨基的事例里，它是一桩事故，缺乏良知，缺乏远见，甚至可能是一种逃避困难的愿望。马契维奇的事例里，它是一个问题，关于某个条理清晰的观点，某种特定的世界观里的盲信。但普通人不管那么多。他知道警察会因为这类事情铲除一个人。他不管布尼茨基是不是花蝴蝶，马契维奇的观点有没有条理。

米沃什：好吧，但约瑟夫·马契维奇到底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

米奇尼克：他的报纸，不过是一块肮脏的抹布，他在上面发表的文章，用当时的观点看，是叛国的。

米沃什：那不是他的报纸，那是另一个马契维奇，波赫丹·马契维奇，编辑。约瑟夫·马契维奇在上面发表了几篇文章，当时每个人都为德国的到来而欣慰地舒了一口气。毕竟，你得考虑当时那个地区完全不同的氛围。经历了苏联占领之后，当地的全体居民都欢迎德国人。受到这种情绪的鼓舞，马契维奇写了几篇东西，它们或多或少和他后来写的《无路可走》是一致的。没有人指责他什么，可能除了那次他去卡廷，但他是获得了地下组织领袖的允许后才去的。还有什么呢？

1944年的夏天，他去华沙找我和明契维奇（Janusz Minkiewicz）。他说，“搞什么名堂，德国人节节败退。这是大好机会，我们应该和他们谈谈，然后搞一份刊物，警告人们，如果布尔什维克来到这里会发生什么。”我们当场嘲笑了他，因为华沙的氛围完全是排斥这类东西的。但显然他和他的妻子出了几期杂志阐释他的观念，可能是在维尔纽斯的时候。没有人记得这个；他们的杂志可能只印了三份。这就是他的政治计划，而且确实付诸实践了……1944年，他们出版了一份前德国的刊物《突围》，他们受德国人的保护。任何人想见他们必须用暗号，因为他们害怕波兰地下组织派人刺杀他们。因此，为什么每个人会追随马契维奇？我不明白。

米奇尼克：我想我明白。这是由双重道德标准统治的历史境况。

米沃什：听着，亚当。这次谈话我确实觉得不舒服，你应该考虑这是在世界的局部，是战争时期的境况，维尔纽斯地区是一回事，而总督辖区是另一回事。

米奇尼克：这种区别正好是一种观察角度。在维尔纽斯地区，“祖国军”领袖可以和德国人协议，但在华沙是决不可能的。

米沃什：但是东部是什么情况呢？毕竟，那个时期整个历史完全被篡改了。它完全被扭曲；它是一个双重标准的制度，有双重标准的通敌合作——表面上是一个而底下的是另一个。这个制度容纳了众多的丑角，例如毕茹特，他是在明斯克委员会工作的白俄罗斯人，同时又是德国政府的行政官员，实际上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特务。这类

事情是不寻常的。在波兰，人们自欺欺人地以为同盟军会来。但在东部，每个人都清醒地知道不会有同盟军；只有布尔什维克或德国人会来，人们要存活必须两者择一。这是可怕的境况。

米奇尼克：当你谈到马契维奇，你指出这个政治路线——我们把它叫做爱国团体吧，是受“民族民主运动”的支持者控制的。你反感我们文化中与“民族民主运动”的精神与意识相关联的一切，我毫无异议。但是如果半个国家都受它吸引，它一定说出了某些基本价值。“民族民主运动”一定是满足了社会中的某些基本需要。因此我的问题是：哪种价值，哪种需要？

米沃什：对我而言，社会有一种对口号的需要，把复杂问题变成简单答案的需要。我想我们同样可以把“民族民主运动”称作一场反对外人的运动，反对任何形态的非我族类。它涉及民族基础上的团结，这是一种盲目的团结，它排斥一切与集体价值相背离的东西。对我而言，它是极端原始的、宗族的反应。

这是一件事，但是德莫夫斯基的理论，是建立在生物学和达尔文主义之上的，没这么绝对化。显而易见，科学的结果无法预料。达尔文主义的所有间接代价，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所有形态，是科学庸俗化的可怕结果。

米奇尼克：在莱德尼茨基的回忆录里，他描绘了这么一幕：他坐在一家餐厅里，在俄国，旁边是一对父子，波兰人。突然，他从他们的脸上看见了无助，虚弱，怯懦。

米沃什：我记得这一幕：虚弱，无助……这些是复杂的东西，而且在他们不知道的地方深深地扎了根。比如说，民俗。也许民俗是一种纽带。语言，当然，我的波兰语。像我说过的，它是我的故乡。语言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唯一拥有的东西。我不是在波兰民俗里成长的。我听的所有歌曲是立陶宛的。

无论何时我去波兰，我有一种奇特的感情。一方面，我觉得有很深的归属感，而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是外人。我裂成两半。变成一个跛子很糟糕。但是如果我不是跛子，可能我写的要比我做的更糟糕。我不知道。

米奇尼克：可能你干脆不写了。

米沃什：可能我干脆不写了。我想补充一点，可能我的视角有了一点改变：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为这个思索了很久，但直到今天我才开始写我的社会根源，我有教养的血统，我曾经尽可能把它藏在我的衬衫底下。就是说，有某些强迫观念使我畏畏缩缩。

我猜，是阶级情结扰乱了我的社群归属感。我有罪感；我想到自己是一个少爷，就会羞愧不已。我是波兰人——说波兰语——是说立陶宛语的农民的少爷。这种状态肯定留下了它的印记。

早年在维尔纽斯，我有点像 19 世纪维尔纽斯大学的秘密社团里的学生。我高中就进了这个圈子，我进大学的第一年周围都是热情的朋友。这并不是孤立，应该这么

说，是进入特殊的知识环境的过渡期，首先，我是用波兰文写作的诗人——这是起码的——然后，基本上只有在波兰的知识环境里我才有在家的感觉。我还要补充，我并不想给人特立独行的印象。

米奇尼克：有时我会有这种印象，例如马克思主义，你做了前所未有的事情。你用你内省的力量观察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世界，是为了让这种观察能用于剖析并揭示马克思主义的邪恶。为什么你不对民族主义一视同仁？我说的再明确一点。你怎么看，为什么波兰文学没有从思想上对“民族民主运动”的遗产作出清算？你看，那些负疚的共产主义者的文章足够糊满三套公寓的墙壁了，却没有关于“民族民主运动”的。在德国，有这种反省；在法国，也有。为什么波兰没有？

米沃什：我不知道德国也有。

米奇尼克：确实有！赫尔曼·劳施宁写了一本精彩的书，《虚无主义的革命》，剖析希特勒的德国右翼支持者的背信弃义。他立足于右翼观点对这些作了清算。

米沃什：再次申明，我有一种社会学的评价。情况是这样的，每个为民族主义出版物写东西的人都排斥在文学圈之外。唯一的例外，当然，是《Prosto z Mostu》周刊 [战前波兰最流行的文学刊物]，而这是编辑斯坦尼斯洛·皮亚塞茨基取得的重大突破。因为他的社会关系，他设法令知识界名流卷入这份刊物；在这个例子里，社会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米奇尼克：你怎么想，关于这个主题，为什么没有人写和你的《被禁锢的头脑》类似的东西。

米沃什：1937年或者1938年，皮亚塞茨基曾邀请我参加一个聚会。所有民族主义名流都在，整个圈子的名流，从音乐和戏剧批评开始——一个名流准备用它在波兰掌握权力，另一个有权势的名流觉得能利用它取代前自由主义的名流。从这个角度看，这次聚会很有趣，但我不会和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讨论基本问题。当然，皮亚塞茨基邀请我加盟《Prosto z Mostu》。我礼貌地拒绝了，这就是最终结局。我从不和他讨论什么。

米奇尼克：在这些应该受到认真对待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底下，没有极权主义的潜在诱惑吗？为什么每个人都是如此？波兰文化名流从不把民族主义这个同伴放在眼里。为什么？

米沃什：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正如我所说，我总是迷上纳夫塔，而不是塞特姆布里尼，而且这是很典型的。迷上纳夫塔的时候，我应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最后分析下来，纳夫塔是极权主义者，右翼的成份多于左翼的。

米奇尼克：我想托马斯·曼的天才在于，他通过纳夫塔描绘了极权主义，一种既来自左翼又来自右翼的极权主义。

米沃什：当然，纳夫塔的真实原型是卢卡奇，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米奇尼克：这是左翼的成份，但纳夫塔对中世纪遗产的想法属于右翼。

米沃什：是的，但我们青年时代的雄辩——在德姆宾斯基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是反对民主自由主义的，换句话说，是反对塞特姆布里尼的。在德姆宾斯基转向共产主义之前，我们经常取笑民主自由主义。

1935年春天，我在巴黎参加了反法西斯文化大会。当然，这个大会是有组织的，可能是——得到了——苏维埃的代理人的援助。我作了讽刺性的发言。他们看上去充满了含混的人道主义口号，反对某种在德国积蓄的危险暴力；他们浸泡在人道主义的虚弱里；而这些只能引起尖利的笑声，就像以前民主自由主义令我和德姆宾斯基发笑一样。每样东西是这样的难以辨别。现在，我们会说，有法西斯极权主义和共产极权主义。当时是很难区分的；当时，有相当多的塞特姆布里尼是马克思主义那边的。

米奇尼克：波佐佐夫斯基（Brzozowski）呢？波佐佐夫斯基可能是唯一认真地与民族主义争辩的波兰作家。你就从没这么做。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

米沃什：我也不明白。可能和我的民族身份的情结有关吧。

米奇尼克：不过我们没必要谈论波兰的民族主义。毕竟，那个时候整个欧洲淹没在民族主义的浪潮里。这样一股思潮席卷了数目众多的普通民众。为什么精英不为它争辩？他们要么屈从要么拒绝，但他们从不讨论它。后来，这个论题也没重现，这意味着我们再面对同样的威胁几乎是毫无防备的。

米沃什：你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论点。没有人认真讨论过德莫夫斯基。人们耻笑他，谴责他，或者不屑他，但没人引发关于他的严肃的讨论。我们拒绝政治思想的某些表象，只是因为他们在一个低水平上。比如，波佐佐夫斯基的想法，根植于文学分析和批评，在那个时代的知识潮流里，在哲学里。但是德莫夫斯基只对波兰国感兴趣，这是他唯一的主题。问题出现了，为什么是波兰国而不是克罗地亚或者中国？我不知道；他只对本土问题感兴趣。

我们必须忘记我们仍处在前共和国的影响里。尽管自19世纪以来，每样东西都变了，战时的波兰只剩下了遗迹。读波佐佐夫斯基的《群体里的孤独》，你会看到乌克兰人问题、边疆问题、波俄关系的重要性；它有一种广泛的梳理。但德莫乌斯基是另一回事，他关注的东西有难以置信的地域性，难以置信的狭隘和本土。

米奇尼克：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做一次比较分析，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两种感受之间？卡罗·艾吉考夫斯基曾写通过一篇绝妙的随笔，“珊瑚礁的哲学”，他论证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把人类视为在道德上是与珊瑚虫等价的，他们的个人权利毫无意义，只有他们联结成一个大的实体，一个珊瑚岛，他们才能获得意义。不管这个实体是建立在阶级上还是民族上。这个观点在波兰非常罕见。事实上，除了艾吉考夫斯基，没有人曾从这个角度分析这些现象。后来只有你确切表述了这种思想，在《诗论》里，说“党是ONR [战前的一个民族主义激进团体] 的后嗣，除此以外就一无所有了，只有对微不足道的个体的厌恶。”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你能回忆起这种观念的发展进程吗？许多年来，这些文字令共产主义者难堪，现在令民族主义者难堪。

米沃什：我怎么会这样的观念？从一开始，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沙文主义宣传是

非常强势的。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一种伪装，尽管他们给自己穿上了民族服装，包括传统的四角军帽。显然，任何观察者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附庸的、傀儡的国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米奇尼克：你对俄国着迷。我曾说，米沃什和俄国有一种爱恨的关系，然后有人反驳，“恨，可能吧，但哪里有爱呢？”我，多少有印象，你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泄露了你对俄国的迷恋。

米沃什：我说过很多次了，我爱俄国，我爱和俄国人交谈，我爱他们的语言。他们有伟大的文学，波兰文学无法和它相提并论。我说的是俄国散文。

另外一件我认为重要的东西，是 19 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变化。每次我试图向美国学生解释当时俄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什么，我常说在喀尔巴阡山脉有很多村庄，那里的人都感染上了一种本地梅毒，但他们开始有了抗体，病毒不会造成损害。如果外人感染上了，他们必死无疑，多强壮也没用。自拿破仑的战争始，俄国知识阶层开始吸收西方文化，送年青军官去法国。在西方，所有那些引致旧制度瓦解的观念，尤其是无神论的观念，逐渐被一个稳定的社会消化。在俄国，相比之下，这些观念被更为迅猛地吸收了。其效应如同俄国知识阶层的肌体毫无防范地被一道闪电击中了。除此以外，知识阶层面对的是一个形销骨立的社会结构，得来的结果只是头脑里的阵阵骚乱，伊凡·卡拉马佐夫的头脑。

从这个角度看，整个 19 世纪的俄国文学，是俄国知识份子的文学，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所有这些观念在俄国文学里具体化了，而且更为粗砺。这就是我迷恋俄国和俄国文学的因由。

但在这里我看到了类似的情形。现在波兰吸收西方文化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这个国家可能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有毒物质，因为西方是颓废的，它有一种高度发达的虚无主义，尼采所看到的欧洲虚无主义。然而，在西方，这种虚无主义存在于非常稳定的社会框架之内，这个社会清楚地知道应该怎么做，应该做什么，而且它的各项职能都运作良好。西方社会也可以应付科学的巨大进步，这可能——我以前说过——依赖于社会不断解体的进程。也许现在，所有这些观念正影响着波兰，就像从前本地梅毒影响那些无抗体的人们。

米奇尼克：你常把自己归类为极端的反西方分子。你在西方生活了四十年，周围全是外国人。基本上，除了波兰文化，你从不尝试成为其他文化的一部分。告诉我，你对西方的态度是怎样的。

米沃什：我想我引以为豪的是，我在西方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却没有蜕变。这是一种胜利。我可以因为失去方向而蜕变；我也可以作为一个诗人而崩溃。这是非常奇怪的。我的一个朋友常说，“怎么回事？那些俄国的流亡诗人无法忍受了，他们疯了。你怎么会立志当一名诗人的？”

我确实无法融入其他文化。在法国，是因为所有知识份子都仿效萨特：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 20 世纪哲学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融入法国是办不到的。

在美国也是一样，尽管有一些我没有预计到的例外情况。我的诗集译成了英文，我到处朗诵我的诗歌，我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美国的诗歌和文学圈。在美国，我感觉舒服的是，我获得了一定的身份；我并不完全是外人；他们接受我朗诵我的诗歌。有某种感觉，我是一个美国诗人，尽管很明显，我所有的诗歌都是从波兰文翻译的。

换一种考虑，我还是无法融入，因为我的思考还是在波兰时我们圈子里的那一套。另外，我特别抗拒、警惕新潮玩意；完全抗拒时尚。也许古姆布罗维奇和他的作品影响了我——对各种知识和文学时尚，持一种反对态度，甚至是傲慢。不过很难讲，如果我没有天主教的背景，没有天主教的教育，没有一种强烈的神圣感，没有受到奥斯卡·米沃什的影响，是不是还会这样。他教导我，既要抵御法国也要抵御美国。

米奇尼克：你能不能告诉我，1968年的学生运动，你经历了什么？当时你在柏克莱，因此你处在事件的中心。在你的书《圣弗兰西斯科湾的幻影》里，我发现你对这次冲突有一种极端矛盾的态度。

米沃什：我写这本书付出了很多心血，我想揭示这些事件本身尚未引发的后果；事实上，它们引发了一种极端强烈的反应。当你站在大学建筑物的窗前，和一位德裔教授看着他们烧图书馆，然后她说“我见过这一幕”，这着实令人伤心。因此写作时，我把自己放在一定距离之外，仿佛这些是瞬间的、短命的事件。在柏克莱，那些年轻人把自己驱向暴乱。有一次，我让一个嬉皮搭我的便车，然后他说，“革命，明天就会有革命！”当时就是这种氛围。

也有一些好笑的事情。有一群学生在一条小径设置路障，我走了过去，用最标准的斯拉夫口音说，“走开！你们这些被宠坏的中产阶级孩子。”他们被震住了。

其实这些事件也是非常严肃的。这是一种冲破老一代设置的樊笼的尝试，一种瓦解旧秩序的尝试，这些年轻人受到良好的愿望的鼓舞，我很难去谴责他们。不过，我是少数几个敢在学校议会投反对票的教授之一，有些提案非常荒谬——例如，有一项提案禁止学习外国语言。大多数学系都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懦弱和顺从。

米奇尼克：你对现在横扫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潮流有什么反应？在波兰很多人都在写这个，很多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书在出版。美国的右翼时尚起来了。你对这个有兴趣吗？

米沃什：没有，真的没有。这没什么了不起。

米奇尼克：如果你必须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地图上给自己定位，你会站在哪一边？

米沃什：在家里，我总是和我的妻子卡洛尔谈起这个。她支持民主党，坚决反对共和党。但我通常会说。“行吧，我愿意投票给民主党，我登记做一个民主党党员，但为什么他们这么愚钝？他们既没有政纲，也没有个性。”我一点儿也不需要这种开给美国的特效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关心资本主义和美国生活的可怕的形势——或者你在波兰看到的对美国的完全无知。当我阅读波兰的出版物或者波兰的文学杂志，我的印象是人们从美国学来的只是流行文化的渣滓，没有任何称得上有趣和有创意的东西。美国有巨大的社会不公正，有吓人的贫民区。那里有很多问题，引起了复仇的呼声，需要解决——所以我对民主党是有抱怨的。因此，我把美国生活视为 20 世纪的启示的一部分。

米奇尼克：你觉得现在美国最有趣的东西是什么？

米沃什：从文化的角度看，美国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景观，因为它已经被法国的知识时尚渗透了。在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的影响之下，解构主义者在好几个大学里安营扎寨，并且与每个他们认为是“老套”的，或者不懂解构主义的人开战。在英文系，你会发现他们轻蔑科学和哲学，因为解构主义者认为只有文学批评才有价值；他们把它视为人文学科最先进的前哨。这是一种法国病。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类似的病。

很大程度上，美国学院的氛围也是由 1968 年的革命者们塑造的。现在他们成了教授，但他们没有多少进步。柏克莱充满了这些怪异的化石。跟随法国的潮流，他们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氛围。

米奇尼克：面对这种环境，你的宗教身份会有什么反应？1958 年，你在一封信里写道，你还没向你的读者揭示你的天主教的根源。后来你开始这么做了。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吧，关于你和天主教的关系，还有它在岁月里是怎么波动的。

米沃什：一个分分合合的过程。这个波动的过程始于中学时代，我和我的教义问答老师的争吵。波兰天主教太波兰化了，我受到排斥。在波兰真的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你卸下内心的重担，或独立的宗教思考带来的问题。神秘主义仍然被当成知识的猜疑，并且“神秘”这个词只意味“猜疑”，因此我必须小心谨慎，尽量明晰，避免我的写作被归类为神秘主义。在这方面，奥斯卡·米沃什的作品起了关键作用。但这是复杂的、个别的事例。

米奇尼克：他不是天主教徒吗？

米沃什：从 1927 年到他去世，他始终是一个践行的天主教徒。他还经常告解，寻求指引。他选择立陶宛，宗教动机扮演了重要角色。1914 年，经历了一次神秘体验之后，他决定服务人民，然后他又发现自己服务的目标是立陶宛，这个小小的，遭践踏的国家正努力想站起来。因此对于他，天主教教义意味着要积极服务人类。

米奇尼克：你和美国的宗教生活是什么样的关系？

米沃什：我在美国也有很多难题，在梵蒂冈二世之前，传统的天主教教义是极其刻板 and 保守的。而在梵蒂冈二世之后，出现了认识世界的狂热，去适应世界，以至于在教堂里听布道可以听见令人惊讶的异端学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是人性的反应。

米奇尼克：你一直是信徒吗？

米沃什：不完全是。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已经去世了，她曾写信给我，“在你整个人生，你总是既说是又说不是。”这令我想起帕斯卡尔的理念，“信仰、犯罪、怀疑之于人类，正如奔跑之于骏马。”

米奇尼克：今天教堂对你意味着什么？

米沃什：教堂主要是，神圣恩典。换句话说，教堂建立在圣体的神秘之上，变体的神秘和圣餐。大体上，我无法想象天主教或东正教教堂之外的基督教。我一点儿也不受新教吸引。

教堂对于我非常重要，在这个地方我发现自己是与别人同在的，在神圣的存在之中。同时，敬意也是一个基本的考虑。我不会接触任何缺少敬意的哲学。对于我，教堂把它所有的敬意给予了——我们可以呼唤它的全名——上帝。

米奇尼克：你是怎样遭遇西蒙娜·薇依的？她有一种强烈、深刻而炽热的虔诚，但又离经叛道。

米沃什：她的第一本书好象是查普斯基（Józef Czapski）借给我。然后我就想编一本她的文集。我的结论是为了波兰尤其值得这么做。西蒙娜·薇依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使命的一部分——献身于波兰的异端宗教思想。1958年，我编译的西蒙娜·薇依文选由“文化”社〔波兰流亡文人在巴黎创立的杂志社〕出版。后来，我很高兴地被柯米聂克主教告知——1917年他在巴黎——这本书在他的教区的所有神学院选为必修书籍。可能我间接帮助他们培养了一批明智的神父。

米奇尼克：你翻译西蒙娜·薇依的作品署了名，还写了导言。但你翻译雷蒙·阿隆的书《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没有署名，同样是“文化”社出版的，但你没写导言。为什么？

米沃什：因为我不同意书中的观点。现在我认为阿隆是对的，但他超前了20年。

米奇尼克：换句话说，尽管你是对的，但超前于时代是危险的事情；不过你有同样的问题。

米沃什：是的，经常有这种情况。但我依然强烈反对一种狭隘的对《被禁锢的头脑》的阐释。我不同意所有那些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角色的阐释，我不同意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群众机会主义和纯粹的恐怖。

最近我和几个年轻诗人对话时出现了误解。我说，斯大林主义是一股强力的思想力量，然后他们谴责我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已经明确说明了，这样一股力量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是欧洲虚无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波佐佐夫斯基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他写道，黑格尔和马克思是哲学上极致的成就，在哲学注定要堕入漆黑的深谷之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动乱，一种癫狂。但为它说话的人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今天俄罗斯提供了一个例子，关于意识形态扮演怎么非凡的角色，以及没有意识形态会导致什么。

米奇尼克：我说的再明确一点：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恐怖，这会使得

他失去理解他人的经验、他人的人生历他人的痛苦的能力。

米沃什：如果我们应用这种解释——强调机会主义是最为重要的——那么，对于德国，会给我们什么的结论？德国人是从机会主义演变成法西斯分子的吗？

米奇尼克：没错。让我们回到我问过你的问题上。你设法清算马克思主义，因为你认识到它有蛊惑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横扫无数的苏联人，遍及世界各地。为什么你不同样地去清算民族主义？毕竟，德国人的例子证明了民族主义能引起巨大的反响。我们在波兰也目睹了。

米沃什：纳粹主义是德国的，而不是普遍现象……

米奇尼克：但民族主义是。

米沃什：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在战争年代，在波兰的知识分子圈？弗迪兰德·戈茨写了一篇颂文给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给民族主义。他赞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波兰，吸引某些人的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还有萨拉查。

米奇尼克：但是关于这些倾向，就再没有别的知识分子的论点吗？波斯洛夫·米辛斯基是一个例外。他写梅斯特尔就是企图检验法西斯主义的右翼根源。但是关于这个主题，你从未写过任何东西。

米沃什：我缺少这方面的组织能力。

米奇尼克：反犹主义呢？你认为，什么是反犹主义的思想根基？为什么会这样，尽管波兰已不存在犹太区了，反犹主义仍然存活于人的头脑和公共生活里？

米沃什：我想这是一个文化累积的问题。犹太人的形象在波兰文学中定型了，是一种荒谬的样板，一个敌对的形象，因为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犹太人在波兰经济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放贷者、旅馆老板、零售商家——几乎所有商业都在犹太人手中。这些样板毫无疑问存在很久了。当然，你可以把反犹主义分析成一种心理现象，但我不会这样做。

我看了卡迪·朗斯曼的《大屠杀》(Shoah)。它令人不安，但我也发现它惹人讨厌。当然，他展示的波兰人是悲惨的生物。朗斯曼的视角确实是一个巴黎知识分子对这些原始人的轻蔑。令人难受，但他抓住了他们的某些特征。即使在这部电影里，你也能看见他们和犹太人之间的对比，犹太人属于另一个文明世界。亚历山大·瓦特说过，犹太人的传统认为，人应该不断读书学习。当然，有些贫穷的犹太人没读过书，但总的来说，瓦特是对的。而在犹太人旁边的是这种波兰东西；在原始的斯拉夫风气里，它是懒惰，反智，不懂思辨。

此外，犹太人在波兰已经历了好多个世纪，不是因为审慎的政策，而是因为惯性。中世纪时期，英格兰驱逐过犹太人。犹太人定居波兰，在德国的大屠杀之后逃了过来。他们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小镇居住，本质上，是犹太区。他们生活在凄惨的贫穷里，因为他们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人口的相对比例总是很重要的。

米奇尼克：你的经历对你意味着什么？自从离开波兰，你为《文化》月刊写了一篇文章“不”，你说你把自己看作一个反斯大林分子，左倾的。今天，左倾这个概念有什么含义吗？

米沃什：它有特定的含义。最后分析下来，例如，政教分离的概念可以视为左倾的遗产。但它只是左倾的遗产吗？毕竟，杰斐逊很难被当成一个左派。

米奇尼克：同样也可以说戴高乐或吉斯卡德·德斯坦，他们也支持政教分离。

米沃什：当然，要有某些左翼的直觉，而我认为我有这样的直觉。

米奇尼克：它们是什么样的直觉。

米沃什：人不应漠视人类的苦难，因为它呼唤来自天堂的复仇。我的朋友约瑟夫·泽克维奇，他既不是左派也不涉足政治，曾描述华沙的一个火车站，充满了饥饿和无家可归的人，他写道：“从这里，耶利哥的城墙在坍塌。”左倾就是希望做些什么改变这种情况。

多年以来，我的诗不再直接关注社会问题，但它们始终还在那里。在《猎人的一年》里，我描述了我在夏威夷的逗留。夏威夷文明是封建社会，建立在一种残忍的宗教上，包括人牲祭祀。但是因为它已经被摧毁了，因为它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我有一种与它休戚相关的感觉。这也是一种左翼直觉的表达。我年轻时也是这样的；当我读一本关于巴巴罗萨毁灭米兰城的书，我悲痛地哭了。

米奇尼克：诺贝尔奖对你意味着什么？在六十年代，你写了一本书，《蝎子群里的人》，我们很多人都读过——至少这个标题——暗示了你自己的人生经历。然后突然间，这个可恶的诗人获得了最高的荣誉。

米沃什：我从来不是那种渴望诺贝尔奖的作家。显然，毕竟还是有不少人用一生去等候领取这个奖，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如愿。这确实非常奇怪。无论如何，说什么——这个奖是因为团结工会而颁发的——是不真实的，因为在1980年五月，当裁决抵达时，团结工会还不存在。十月份我获奖时，瑞典学院极其恼火，因为它看起来太政治化了。我尽量不那么政治化，因为我能感觉到他们的不自在。瑞典学院不喜欢太显山露水。

我确信如果我呆在法国，我永远也不会得奖。如果我还在波兰，事情会是怎么样的，我毫无头绪。事实是，我的诗的英文译本起了极大的作用。

米奇尼克：可是它对你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任何一个作家，这是不寻常的时刻，而它给了你……

米沃什：我告诉你：从里面看这件事是一回事，从外部看又是一回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从外部看，除了一个相当小的圈子，我是寂寂无名的诗人。

米奇尼克：到了1980年，波兰的文学老师们才突然发现有一个诗人叫米沃什。

米沃什：是的，这是令人惊奇的，一跃就到了诺贝尔奖。但我认为自己是一名杰出的诗人，能令一打左右的读者满意。因为从我的观点看，这没什么了不起。毕竟，我在美国出版了文选，而且我作为一名诗人，受到了尊重。在波兰，我不出名。因此你不得不把这两种看法都掂量一下。

显然，诺贝尔奖能令你昏头。索尔·贝娄说，诺贝尔奖可以成为“死亡之吻”。在这里，我可以骄傲地说，我得奖后的这二十年，是充满创造力的二十年。

米奇尼克：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奖，你有什么感觉？

米沃什：巨大的满足，无比的喜悦，可能是因为它给了另一个流亡诗人。我们是一连串：米沃什，卡内蒂，辛格，奈丽·萨克斯，还有布罗茨基。

米奇尼克：你感觉和作家布罗茨基亲近吗？

米沃什：作为随笔作者要比作为诗人更亲近一些，因为我们的诗是很不一样的。

米奇尼克：最近，你时常提到波罗的海诸国的问题。在你的知识生涯，这是一个持续的主题；在《被禁锢的头脑》里你写过波罗的海人，然后在你的诺贝尔获奖讲辞里你提到了他们。

米沃什：我提到波罗的海诸国和斯德哥尔摩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是出于一种道德负疚感。在我无边的梦想里，我从未想过我会看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正式受到谴责的这一天，而波罗的海诸国能重获它们的独立。这些都是遥远的未来。这关于波罗的海的章节能受到关注同样是遥远的，我清楚记得，我把它放进《被禁锢的头脑》时是多么地犹豫。

米奇尼克：为什么？

米沃什：我没把自己当成对抗邪恶帝国的武士。我想限制自己在文学之内。收录关于波罗的海的章节意味着超出了这个范围，超出了波兰，而波兰是全书的焦点。不管如何，我还是收录了它。我仍然对波罗的海有兴趣；我和托马斯·文克罗瓦是朋友，而且我把爱沙尼亚诗人卡普林斯基的一些诗译成了波兰文，通过英文转译。

米奇尼克：今天，你给我读了共产主义之死的挽歌。共产主义的终结对你意味着什么？你整个人生，你不得不对付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猎犬经常尾随你的脚步。现在我们该如何生活？没有共产主义，人应该怎样生活。

米沃什：我个人非常高兴看到共产主义的终结。但可能很多人会想在共产主义之下更好一些。还会有一个可怕的迷乱时期，人们会拿来西方的残渣并且事事模仿美国，包括物质文明。

在一个新的后共产主义世界里保持感觉和平衡，需要牢固的基础，但人们还没有。什么会存留下来？一方面，是天主教；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这会提供某种参照系。如果民族归属成了世界的主要组织原则，人们会牢牢抓住它。没有什么是新的。到现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已经看到民族主义或者大俄罗斯帝国主义在各地取代

了马克思的教条。看起来它还会持续下去。

米奇尼克：你写过一封信，你把自己定位在 18 世纪末的波兰：你强烈反对波兰的民族主义，但你也强烈地反西方……

米沃什：我和《公共事务》的编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他们歪曲了我的论述。他们得出结论说，我希望波兰成为一种野外博物馆，一座文化博物馆，我认为我们不该写任何新风格的散文，我们应坚持古老式样的说书。这是完全的理解。我不想创建什么博物馆。我只是希望，前四十五年丰富而戏剧化的经验可以创造一种抗毒素，令我们具有免疫力，抵抗那种毫无选择地攫取西方的白痴玩意的欲望。

今天，我不再坚持这样的希望。我几乎看不见觉醒的迹象，而苦痛正在来临。今天，甚至没有人愿意听这个“团结”年代所必须的诺言和口号。人们想拒绝每一样东西，似乎它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已经陈旧和过时。

我看不见任何以价值的名义与西方开展的争论，不仅仅在波兰，其他经历了共产主义的国家也是如此，本该有更明智的争论的。我看不见任何争论，我看不见任何拒绝某些在西方风行的倾向的尝试。毕竟，我们要意识到 20 世纪还有很多启示的元素。共产主义的崩溃不意味着启示的终结，因为启示取决于完全的流变，没有坚实的基础。这都是尼采预言过的了。

米奇尼克：过去的二十五年，有新的作品和新的名字在波兰出现，你有什么感受？

米沃什：我觉得卷入了在波兰发生的事件之中。这在 1981 年就体现出来了，我和那些印了我的书的人们见面。非常令人感动。所以我的孤立只是相对的。1951—1956 年，是我感觉最孤立的时期。我紧随国内的思想动荡，然后《记录》[创立于 1976 年的地下文学刊物]出现了。我把许多波兰诗译成了英文，赫伯特的，还有其他人的。你可以称呼我是一个“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或“流亡者”，但我想我已经做了很多了。

米奇尼克：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今天，文学是什么？

米沃什：简单，但又非常复杂，非常复杂，因为今天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登场了。事实上，这和大学里的英文系里一场革命有关。文学教授们想把自己看作泥土里的盐；哲学完了，科学无法处理本质问题。词语和真实之间的边界模糊了，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客观真实，实际上语言就是一切。

我不得不与我的那种对客观真实的古老理解对立起来。它是根植于我的世界观的。我相信客观真实是存在的，而艺术，在于与这真实发生联系，试图抓住它。毫无疑问，某些文学类型正在遭遇灾难，而且可能会死亡。

不过，考虑到小说在波兰文学里实际上不存在，考虑到现在这种文学失火了，或者受到了西方的极大影响，来自主观写作的，来自主观艺术的，我想提出以下建议：波兰作家应该用特有的语法和标点写作，不需要内心独白；他们应该写庄重的小说，以弥补自身的缺陷。俄罗斯有一种宏伟的现实主义文学，能追溯到陀斯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比契诃夫更简洁的技巧？然而当我拿起波兰的作品，除了事情本身被数不清的想法弄得毫无必要的复杂外，我什么也看不见。在我看来，波兰文学处在过于偏重形式的危险之中。

我对当前的文学有诸多批评。我读的很少，而且我几乎不读小说。我问我自己，这些年我留下了什么，我还需要做什么，还有什么责任未尽。我只读我必须读的书。我最近在读芬兰的历史。

米奇尼克：我也要极力推荐爱尔兰的历史。非常迷人，而且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无以伦比的向导。除非你了解历史，否则《尤利西斯》是无法理解的。

米奇尼克：是的，从这些缠绕的爱尔兰的根茎，乔伊斯志在创造世界级的文学。一项伟大的成就。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做类似的东西，建立在波兰一立陶宛的根茎……我已经尝试做了一些。

米奇尼克：你如何定义文学里的谎言？

米沃什：我如何定义？这取决于这篇文学作品是不是好的，如果是，那么我们不用这个判别标准。这个问题涉及另一个问题，一个很坏的人能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

米奇尼克：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关注的是艺术的谎言。

米沃什：人是通过非理性途径辨认艺术的谎言的。你看了一页，然后你要么看下去，要么不看，就是这样。

米奇尼克：在文学范畴里，“背叛”这个词有什么含义？艺术家有一种天职。从何种角度，我们可以说他背叛了这天职？

米沃什：对我来说，约瑟夫·康拉德的例子可以提供答案。康拉德所关心的，首先而且是第一位的，是用文学谋生，但是当他审阅每一本书，有好几次他把每一行都划掉了，在痛苦之中。为什么？他可以飞快地写，他可以用耗尽自己的方式赚钱，但他就是没有，尽管他经常债台高筑。如果他抛弃了这些准则，他就做了背叛的事。有一个强制性的声音命令我们坐下并且尽最大所能地创作。

米奇尼克：你在写作时，有没有那种时候，觉得自己在做背叛的事？

米沃什：我说说这个。我写小说《权力的攫取》时，我的时间不够，而且为了竞争我必须及时把它完成。当珍妮·赫斯琪告诉我它写的很好而我是一个好作家时，我对她说，“不过，这篇小说不是那种能归于任何艺术意义的文学类型。”这就是真正的背叛，因为我用一种体裁写作，却无法辨认它的艺术价值。

然后我写了另一部小说，《以撒谷》。我写这部小说，是因为我经历了诗歌里的一场灾难。我的内心灾难是与虚无主义相连的，为了让自己摆脱它，我不得不写《以撒谷》。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以撒谷》是一次治疗经验。这可能接近于回答了你的问题。

米奇尼克：告诉我，当你回头看，你最高兴的是什么，你最遗憾的是什么？

米沃什：我在一首诗里写过，我不遗憾我从未成为维尔纽斯的杰出市民，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没能和费拉拉或摩迪纳建立联盟。要让我留在那里，唯一可能是，历史变换另一种模样重新来过。我怀疑，如果真是那样，我是否会遭遇布尼茨基相同的命运，在1939年，他政治破产之前。你只有读他那个时期的诗才能看见他陷入了死局。但这都是理论上的。

米奇尼克：在工作中，你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米沃什：当然，总有一些我最好能避免的东西。我想我的起步有一点疯狂。我太关心意识形态和政治，我太努力了以致成不了政治动物。我写过白痴文章，高压的，日丹诺夫式的东西，没有任何真材实料。

我还有一些诗歌是一个错误。战争期间，我受维尔辛斯基——其实就是受地下戏剧委员会委托——为一个剧场开幕写开场白。基本的设想是什么？没有信念，却有设想？当时战争要结束了，华沙有一个剧场开幕的庆祝会，维尔辛斯基为此找我写开场白，他还委托我翻译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因为那个戏剧讲的是逃跑到亚耳丁森林，最后一切皆大欢喜。因此，我写了这个开场白，我感到有些羞愧。幸运地，它从未上演，因为它非常虚弱和虚假。显然，我没有充分认识到苦难的波兰……

米奇尼克：如果有人问你，人应该怎样活，你怎么回答？

米沃什：在19世纪，瓦西里·罗赞诺夫写道，“他们问我：我们应该做什么？我回答：你该做什么？采集浆果，腌渍好，然后吃掉它们。”

我只能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上回答，因为我的心理和生理特质，我不安定的性情，如果我不是经常受我的内心魔咒驱动，我完全无法运转。晚上，当我无法入睡，一行诗突然进入我的头脑，我就会安然睡去。因此，我的经验是，人在清晨须早起，然后尽量写下几行。当然，这并非适用于每个人的处方……

米奇尼克：早起，写作，然后采集浆果。那就让我们去采集浆果吧。谢谢你的谈话……

（译者说明：这是一个减缩本，删去的不是所谓敏感的部分，而是他们谈到的一些波兰文坛的人与事。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我们对波兰文坛的许多人物和事件知之甚少，原文又没有注释，考虑到阅读起来很乏味，就删掉了。）

胡桑按：本谈话录选自《通往公民社会》，崔卫平主译。自印。

链接：<http://www.unicorbbs.cn/dispbbs.asp?boardID=17&ID=28876&page=24>